

本土主义的异化：特朗普政府移民治理改革的内核与路向^{*}

王聪悦

【内容提要】 移民政策既是美国社会的焦点议题，更是特朗普两次执政期间开展改革的重心之一。特朗普对移民的悲观态度和严控立场将其“美国优先、回归传统”的口号具象化，其“强化国家边境控制、强调国家主权与资源保护”的治理逻辑从根源上说与本土主义思潮复归乃至异化密切相关。曾在美国历史上多次引发大规模排斥移民行为的本土主义思潮，不仅成为当前特朗普政府开展美国移民治理改革的思想内核，其异化更为特朗普利用公众的“主体性丧失恐慌”、将改革描绘为对国家危机的必要回应提供了关键支撑和路向导引。在异化进程中，本土主义全方位作用于美国的移民治理，构建出“福利经济幻象”“新郊区理想”“逆同化”现象、复杂移民区域迁移策略等理解美国社会图景的新观测变量，由此为特朗普政府的两次移民治理改革锚定路向。从效果看，以本土主义异化为内核的移民治理范式转换不仅重新定义“美国化”内涵，且对美国改善民主制度和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构成根本性挑战。

【关键词】 特朗普政府；移民治理；美国本土主义；本土主义异化

【作者简介】 王聪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 邮编：100007）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25.04.007

【中图分类号】 D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25）04-0119-17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号：DF2023YS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移民治理是特朗普两度就任美国总统的改革重心之一，其“强化国家边境控制、强调国家主权与资源保护”的治理逻辑根源于美国本土主义传统的周期性复归。本土主义通常在美国社会的福利资源分配焦虑和国家认同与文化焦虑中完成自我巩固，并在移民群体的区域迁移策略以及处理同本土人口的群体间关系过程中实现纾解。近年来，受到美国政治极化、经济分化、认同虚化、文化窄化的共同作用，该思潮从防御性、排外性限制移民，升级为裹挟着怀旧感、褫夺感的系统性疏离和激进反抗，进而衍生出一系列描述美国移民现况和影响政策改革方向的新观测变量，如围绕“身份政治资源化”而生的“福利经济幻象”；强调身份防御和文化排他的“新郊区理想”；为逃离政治操控、文化排斥、空间惩罚而形成的复杂移民区域迁移策略；以及体现移民群体认同撤回与地缘自闭的“逆同化”现象。随着特朗普第一任期确立“美国优先”的移民政策改革基调，并在第二任期继续制造“震慑与威吓”（shock and awe）效果，进一步刺激、策应了本土主义的异化倾向。^① 上述新观测变量不仅在特朗普政府对移民系统的“右向”重塑中清晰可辨，还通过引导社会舆论和公共话语放大了美国移民治理中的“文化防御—政策排斥—社会隔离”认知链条，该趋势不仅将重新定义“美国化”的内涵，也对美国改善民主制度和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构成根本性挑战。

一、本土主义的内涵与美国移民政策历史鉴镜

宏观而言，本土主义是指自我认定的本土人口试图通过其感知的外国性，保护或保留他们对本国有限资源（如公民身份、教育、工作机会等）的优先使用权或独占权，以抵御现居或寻求永久居住的移民群体所带来的挑战。^② 其文化本质即种族化的国家认同，政治本质即族群权力的再分配焦虑，经济本质即掩盖上层剥削、向下追责的求偿行为，情感本质则是集体自恋、贬损对外群体与竞争性受害者心态的聚合^③。在此基础上，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将美式本土主义厘定为强调“真美国”标准化、排他化、至上化的复杂意识形态，和排斥天主教徒、激进分子及种族群体的

① Muzaffar Chishti and Kathleen Bush-Joseph, “With ‘Shock and Awe’, the Second Trump Term Opens with a Bid to Strongly Reshape Immigratio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January 23, 2025,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trump-second-term-begins-immigration>.

② Brian N. Fry, *Nativism and Immigration: Regulating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LLC, 2007, p.9.

③ 刘颜俊、王禾：《阴谋论信念的政治心理学：基于文献的讨论》，《北大政治学评论》2024 年总第 16 辑，第 96—126 页。

三条运动线索。该思潮往往与美国历史上民族认同的不确定性、经济焦虑和重大社会变迁密切相关，^①并可结合其社会文化实际解构为三重内涵：

首先，“归属性传统”（Ascriptive Tradition）。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在《公民理想：美国历史上相互冲突的公民身份愿景》一书中指出，美国政治发展进程中除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传统外，还有个传统贯穿始终，那便是归属性传统。^②它是根植于出身、血统、宗教、种族、性别等“先赋身份”的社会秩序观，强调个人地位与权利是“天生的”，而非通过普遍公民资格或个人努力取得的。正因为“归属性传统”从价值尺度、政治理念和法律制度上支撑着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优越性，并与“人人平等”“多元共生”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完全背离，使其在与当前人口焦虑、经济不平等、政党极化等现实相结合时，为本土主义提供历史与情感基础，且导致其异化进程彻底抛弃回归更狭隘的“血统/文化特权”。

其次，对“外来者”的定向排异和降级接纳。定向排异衍生出了“拉一派、打一派”的功利性移民接纳模式以及以白人身份政治为核心的运动套路；降级接纳则意味着即便勉强引入“不受欢迎”的群体成员，也只能给予其“二等公民身份”，将其置于无权平等参与民主生活或其他社会生活、政策观点合法性较低、理应获得较差公共服务的特殊境地。^③

再次，走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的话语路线。作为民族主义的特殊构建，美国本土主义一则护持范畴不拘泥于民族国家这种大型政治单元，可在州、地方甚至原住民保留地发挥特定影响。二则其自由和主权叙事并不必然与摆脱外部约束及控制特定领土资源挂钩，而是将关注点置于某个移民群体是否对现存“美利坚民族”的本质构成威胁之上。美国本土主义的确常借民粹主义实现反移民动员，但它比民粹主义能更好地兼容“精英—草根”二元对立框架。只有当本土主义领袖刻意将现有移民政策描绘为“精英允许移民或少数群体进入并‘玷污’国家”的民粹主义场景时，这两个概念才有所交合。

另外，与种族主义关注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绝对区别相比，本土主义趋于相对，主

① Peter Schrag, “Unwanted Immigration and Nativism in America,” *Immigration Policy Center’s Perspectives*, September 13, 2010, p.6.

② Rogers Smith, *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 History* (The Institution for Social and Policy Studies),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1.

③ Aitana Guia, “The Concept of Nativism and Anti-Immigrant Sentiments in Europe,” EUI Working Paper MWP, No.20, 2016, p.13.

张防范文明内部的野蛮风险，但可以在政策上支持同化。恰如海厄姆在《土地上的陌生人：美国本土主义模式》一书中所言：“本土主义隐约折射出美国历史上的部分宏观图景，反映出我们的焦虑，划定了我们宽容的界限。”^①

事实上，本土主义思潮与移民政策在美国语境中存在深刻的互构关系。前者为移民限制政策的成功出台提供核心动能，而移民治理改革的内容和方向也会反向影响某一时期本土主义的强弱、样态和目标。这也使得移民政策和反移民运动成为本土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场域。早在殖民地时期，类本土主义偏见便已在盎格鲁—撒克逊殖民者对非英裔移民的敌视中潜滋暗长，但因殖民地定居基本处于开放状态，此类立场尚未形成社会情感或集体意志。直至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大量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和德国移民涌入美国，出于对外国密谋颠覆新生共和国的担忧，本土主义情绪迅速激化。以“一无所知党”为代表的有组织反移民运动顺势展开，并提出了诸如限制移民数量、提高移民门槛、加强边境管控、限制移民权利、维护本土文化等一系列管控主张。19 世纪后期，一方面以不讲英语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为主体的东欧、南欧移民涌入美国，另一方面美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率上升，社会矛盾激化，华人劳工在美国西部引发了白人工人的不满和排斥，一些政治家借机推波助澜，促使首个明确针对特定族裔的联邦移民限制法案——《排华法案》出台。自此，本土主义情绪被具象化为对移民威胁本土人口就业机会、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灾难化想象。20 世纪 20 年代，本土主义运动继续从生物种族主义和“外来文化稀释美国本土文化”的舆论声浪中汲取力量，并随着 1924 年《移民法》的出台达到高潮。该法引入国籍配额制，通过限制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移民来源和数量，保持美国文化与种族的“纯洁性”以及社会同质性。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大发展，1965 年《移民与国籍法》废除了配额制，重点支持家庭团聚和技术劳工，这标志着本土主义驱动美国移民政策的阶段性转折。^②

尽管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本土主义思潮天然携有排外基因，但仍以内聚国家认同为出发点，并通过如下四重变量改造和呈现美国的移民政策：一是以“经济理性”为核心的传统福利资源分配焦虑。它是美国社会在接纳和安置移民过程中对福利资源限度、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隐忧，^③更大程度上聚焦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张力，而非“谁拿走了我

①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xi.

② 蔡鸿：《美国非法移民问题的由来与治理困境》，《国际政治研究》2024 年第 6 期，第 45 页。

③ John E. Roemer, “The Global Welfar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Vol. 27, No.2, 2006, pp.311-325.

们的资源”。二是经济逻辑主导、种族隐形隔离维持下的传统郊区认同。彼时，郊区指向“拥有房产、良好教育、远离贫穷与城市犯罪”的“美国梦”，虽然其中夹杂了未公开亮明种族动机，但力求维持“郊区白化”的排他性社区构建路径，总体可视为空间上的阶级跃迁手段。三是移民基于资源适配和社会融合双向考量形成的迁移策略。即便移民群体的流向确实包含了对本土主义意识形态攻击的回避动机，如种族歧视、身份排斥等，但其整体迁移逻辑仍主要建构在个体发展、经济机会与家庭重聚等理性选择的基础上，核心是寻求生活改善与社会流动空间，而非应对系统性身份压制与空间政治的紧张。四是通过时间积累逐步融入的同化进程。纵然不乏本土主义偏见责难，但美国主流社会仍为各类移民提供了包括教育、公民身份、就职通路在内的认同空间，且将其视为“可教化”的他者，因此移民群体呈现出第一代保持母文化、第二代掌握双文化、第三代高度美国化的逐步融入特征。^①

二、异化进程：本土主义的演变与美国移民治理新观测变量

2016 年堪称美国本土主义走向异化的关键节点。随着特朗普首次担任美国总统，本土主义已不止步于对现有社会秩序的防御性护持，转而以更激进、更绝望、更具破坏性的方式重新定义“美利坚价值”和“谁是美国人”，逐步演化成为一种带有惩罚性、去人性化和空间净化意图的政治工程（见表 1）。

表 1 传统本土主义与异化后的本土主义特点比较

	传统本土主义	异化后的本土主义
基本诉求	保护国家的本来面貌	怀疑国家合法性，甚至支持某种“国家再造”或“革命式重置”
合法性基础	国家认同与文化融入标准	主权、治安、疫情、恐怖主义等“危机叙事”
主要关注点	控制移民数量和质量，保护传统文化、工作机会、社会结构	认为国家已被“外力”侵蚀，对现有体制、精英阶层甚至国家本身感到绝望和敌视
手段	立法限制、社会运动、舆论宣传	极端化叙事（阴谋论）、暴力化倾向、政治极化（支持极右翼、反建制候选人）、信息茧房
社会位置	自认为代表主流社会价值和 国家核心利益	自认为被边缘化，被国家和主流社会“背叛”，是受害者和为人民而战的孤胆英雄

^① Alejandro Portes and Rubén G. Rumbaut, *Legacies: The Story of the Immigrant Second Generati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29.

与传统理路相比，本土主义在如下层面发生异化，并对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治理改革发挥导向作用。

第一，本土主义的生发动因异化与移民政策迅速收紧。本土主义的生命力之一即对他者占用美国制度红利的恐惧。^①然而，当前随着本土人口日益高涨的“反移民”情绪刺激，移民群体充分体验到了美国社会体系固化、排异的一面，开始放弃全心融入，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放于构建游离于本土体制之外、立足于本族群人口之上的全新社会结构和生活空间，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体系集本族关系、惯习和赴美生存之道于一体，让群体内新移民无须寻求美国原有制度和文化体系支持便能快速适应生活。^②该现象突破了美国本土主义对本国制度遭到不当利用或透支的担忧，甚至使其陷入被彻底架空和抛弃的风险，结果是新移民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移民化”后与本土人口在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和社会联结方面渐行渐远，引发了本土白人对种族阶序体系彻底崩坏的深层恐惧。特朗普上任后便推动移民政策改革，防范他者依托“家族—血缘”等前现代社会因素肢解美国现代移民体系，为美国移民制度重新“立威”。

第二，本土主义表现形式异化与移民政策改革倡导回归传统。传统本土主义通过宣扬美国物产丰饶、制度先进、福利优厚、文化独特的“例外论”，强化任何外来者都可能引发“劣币驱逐良币”风险的判断。然而近些年，随着美国的人口容纳力和再分配能力日渐失调，“例外论”的现实支撑和舆论基础大大削弱了，直接触发了本土主义较为隐蔽的表现形式——怀旧情绪。怀旧对象之一即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来自南欧、东欧的欧洲裔主导的移民潮，本土主义者将他们与当前的拉美裔、亚裔和非洲裔移民比较，美化、夸大早期白人移民的人口素质、劳动精神和同化热忱。^③事实上，这批移民在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心目中亦为低劣、邪恶的“边缘人”。^④怀旧对象之二即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彼时经济繁荣、中产阶级扩张极大地维护了白人劳动阶层的主人翁意识和生活幸福感。大规模当代移民潮尚未启动，黑人民权运动、

① Julia G. Young, “Making America 1920 Again? Nativism and US Immigration, Past and Present,”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Vol.5, No.1, 2017, p.217.

② 刘玉照：《“移民化”及其反动——上海农民工与大陆台商“反移民化”倾向的比较分析》，《探索与争鸣》2005 年第 7 期，第 23 页。

③ Nancy Foner, “Nativism and Nostalgia American Style,” *Appartenances & Altérités*, No.2, 2022, pp.2-4.

④ Library of Congress, “Another Time in History that the US Created Travel Bans-Against Italians,” April 26, 2018, <https://www.wgbh.org/news/national/2018-04-26/another-time-in-history-that-the-us-created-travel-bans-against-italians>.

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新左派运动、反越战运动等进步性“反文化运动”还未借助“政治正确”标签改写美国的传统底色。^①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层面，“美国优先和白人优先”原则都处于稳定贯彻阶段，令本土主义者充满安全感。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本土主义者乐于将怀旧打造成严厉排外和回归保守的“前奏”，对上述两个时期的移民及社会状况进行理想化回顾与浪漫化描摹，其目的有二：一是构建“永恒优雅”叙事，即强调美国本土文化和制度天生优雅，否认各时期美国移民治理的冲突和差异，从而在“非本土他者”与美国历史和谐连贯发展遭到中断之间建立起直接相关性；二是启动“重生模式”，即在对“往日旧时光”的夸大歌颂中，国家历史被美化至优越状态，而当前全美非法移民人数已经超过 1500 万，给美国的边境管控、社会治安、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造成巨大压力的现实则被描述为“至暗时刻”，需要社会各界齐心合力抵御外来者“入侵”，才可迎来新一轮重生。^②事实上，当前本土主义者热衷于借助美国历史凸显优雅与至暗之间的鲜明反差，目标就是唤醒普通民众对本国优越地位的模糊记忆，催生优雅遭到破坏的强烈情感共鸣，同时为不乏反对者的“回归传统”呼声以及移民严控政策背书。

第三，本土主义的施动者、受动者异化与移民政策全面政治化。历史上的美国本土主义大体源于底层民众的经济和文化焦虑，因此草根色彩浓重。然而特朗普借本土主义力量两度担任总统，并用移民治理改革呼应本土主义诉求的做法越来越指向一点，即美国本土主义并非由乌合之众的愤怒所造就，而是由该国当权者掌舵的政治项目。^③从受动者角度看，本土主义的一贯排斥对象系与本土人口文化距离最长、文化冲突最剧烈的新移民，如 19 世纪的爱尔兰、意大利和东欧移民，20 世纪的亚裔移民等。然而，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核心逻辑从种族、文化因素逐步转向法律、经济和国家安全考量，特别是两党在移民政策上针锋相对，本土主义的打击对象日趋泛化，甚至扩展到作为美国公民的移民支持者、LGBTQ 群体、批判种族理论推动者、反殖民主义历史学者、社会正义倡导者、“觉醒左派”等。本土主义施动者的精英化与受动者的无差别性一

① Theodore Roszak,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298.

② Christophe Bertossi, Jan Willem Duyvendak and Nancy Foner, “Introduction: Nativism and Nostalgia. Temporalities i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Europe and the US,” *Nativisme et Nostalgie*, No.2, 2022, pp.5-7.

③ Erika Lee, *America for Americans: A History of Xenophobia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9, p.95.

方面导致美国的移民政策向政治化乃至安全化高速迈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共和党内精英与非精英的阶层割裂，例如硅谷右翼受科技驱动的未来主义诉求和发展优先战略让他们与 MAGA 派对“美国优先”的理解背道而驰。^①

上述变化在特朗普的偏执风格和社会治理政策改革现实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强势输出，^②使本土主义从一种原初的文化保守倾向演变为排外、反多元主义、反全球化的极化政治力量，进而又依托美国社会实现空间和文化重构，演化出了一系列描述美国移民现况和影响政策改革方向的新观测变量。

第一，“福利经济幻象”。在本土主义异化作用下，福利焦虑被从经济效率的理性考量，转化为“身份—资源归属”式的情绪政治幻象。焦虑的中心从“制度是否被滥用”偏离至“谁是资源的合法享有者”。据此，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本土主义者扭曲移民实际经济贡献与移民福利占有之间的舆论位差，引导美国人对移民使用本国福利产生“透支感”和“不配得感”。然而解构美国移民群体的福利收支关系可知，一方面根据美国法律，非法移民无法享受食品券（SNAP）及医疗补助（Medicaid）。新移民在美居住至少 5 年才能申请联邦福利。H-1B 等工作签证持有者需要靠工资支付医疗保险等支出。^③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情况相对复杂，初入美国时，约 60%—70% 的难民家庭使用到某种形式的公共福利。然而此后 5—10 年间，该群体通常会积极就业或创业并减少福利依赖，长期经济贡献可抵消初期成本，特别是子女接受教育后，社会流动性较高。十年后，难民的福利依赖度与普通低收入美国公民相似，甚至更低。^④另一方面，移民在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空缺、促进创新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2023 年数据显示，移民家庭在住房市场上支付了超过 1670 亿美元的租金，并持有超过 6.6 万亿美元的住房财富。即便是被本土主义者诟病为“福利蛀虫”的非法移民家庭也向联邦、

① Patricia Lopez, “H-1B Clash Exposes a Tough Choice for Trump: MAGA or Musk,” *Economic Times*, January 16, 2025,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ri/work/h-1b-clash-exposes-a-tough-choice-for-trump-maga-or-musk/articleshow/117303093.cms?from=mdr>.

②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Harper's Magazine*, No.229, 1964, pp.79-81.

③ David J. Bier, “The Real Cost of an Open Border: How Americans Are Paying the Price,” Cato Institute, July 26, 2023, <https://www.cato.org/testimony/real-cost-open-border-how-americans-are-paying-price>.

④ National Immigration Forum, “Immigrants as Economic Contributors: Refugees Are a Fiscal Success Story for America,” June 14, 2018, https://immigrationforum.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Economic-and-Fiscal-Impact-of-Refugees_Format-Final1.pdf.

州和地方政府支付了 898 亿美元的税款，并具备 2990 亿美元的消费能力。^① 移民还是美国医疗、科技和农业等关键行业的主力。2022 年，移民占整体劳动力的 18.1%，在医疗工作者和 STEM 专业人员中比例更是接近 20%。从以上数据可知，移民“窃取福利”的叙事本质上是本土主义者用语言操控、选择性的数据呈现、政策工具和媒体合作等方式构建的认知幻象。他们将移民与社会福利资源的“损耗”直接挂钩，形成“移民的存在就等于本土居民的经济利益将被侵占”这种畸形社会经济结构观念。该“幻象”若成功植入公共认知，可预见的结果一是为联邦政府养老金系统和医疗保险基金提供财政支撑的年轻劳动力遭到削弱，二是持续流入美国的新移民红利大幅减少，不利于社会保障融资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联邦和州财政之间的矛盾微妙化，特别是在移民依赖度较高的州，州财政和经济会受到很大冲击，需要联邦政府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来应对移民人口流失造成的经济下滑，这种请求往往会因党派政治考量而引发深层矛盾。

第二，“新郊区理想”。在本土主义异化进程推动下，郊区充当了抵制多元文化、全球化和自由派价值观的“美国正统文化堡垒”。该趋势一则与近年来郊区贫困化和移民人口大幅迁入同步发生密切相关。数据显示，到 2009 年，2000 年前抵达的所有移民中有 61% 居住在郊区；近期抵达的贫困移民中也有 53% 居住在郊区。即便如此，郊区贫困化的主体仍为本土人口。^② 正因为本土人口的贫困率提升和人口多元化同时出现在美国郊区这样一个曾经笼罩着传统、理想、法治光环的封闭环境中，快速激活了普通民众的“防御”意识。当特朗普政府提出排他性移民政策改革，把矛头指向那些被认为对中产阶级郊区身份构成威胁的“外人”时，郊区本土人口对移民乃至当地少数族裔的认知彻底实现了从“违反地方理想”到“违反美国秩序”的对接。二则与政党极化把郊区变为文化战争的象征战场，加剧了郊区的价值观冲突与政治再划分。例如大规模兴起于 2021 年“家长权利运动”中，郊区学校董事会冲在反对性别与性取向相关课程、要求对种族议题的教育保持“中立”或减少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强调、要求学校课程和图书审查制度更加“透明”、强调父母对学生教育和道德价值观的主导权等文化战争“中

① 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 “New Data: Immigrants Keep Economy Strong, As Congress Considers Wasting Billions on Mass Deportation,” February 25, 2025, <https://www.americanimmigrationcouncil.org/news/immigrants-keep-economy-strong-as-congress-debates-mass-deportation>.

② Audrey Singer, Roberto Suro and Jill H. Wilson “Immigration and Poverty in America’s Suburbs,” Brookings, August 4, 2011,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immigration-and-poverty-in-americas-suburbs/>.

心战场”的前缘。^①由此可见，美国郊区不再只是消极逃离城市的“中立空间”或“进步城市”与“保守乡村”之间的模糊地带，其文化与政治角色的转变，使其成为“文化同质性”的防线和“排斥他者”的武器化空间。移民则被重新定义为扰乱“美国本真空间”的他者，其存在不仅是资源争夺问题，更是文化、身份、道德秩序的威胁。由此形成一种新郊区理想：文化上，从“中产阶级郊区”转向“部落主义郊区”，种族、族裔、宗教等被视为郊区完成“再净化”的重要指标，同时推动大量右翼民兵、白人基督教社群、家校联动政治运动在郊区落地；空间上，继续打造“类封闭”社区，一方面构筑物理隔离，通过土地使用政策、学区划分、门禁社区等手段维持阶层与族裔边界，另一方面力推政策排斥机制，如限制多户住宅建设、反对公共交通延伸，以防止低收入和移民家庭进入。^②政治上，形成新的保守主义集结地，在这里“保守郊区”与“多元都市”构成新的社会政治断裂带。这种现象强化了“美国价值观被外来文化侵蚀”的本土主义叙事，同时反向培育了移民被边缘化和空间隔离的土壤。

第三，移民区域迁移策略复杂化。移民的区域迁移策略已脱离传统的移民个体经济动因逻辑，转而成为对本土主义者实施文化净化、政治惩罚与空间治理的被动逃离、强迫迁徙或另辟蹊径。首先，主动避险迁移现象增多，鉴于本土主义缔造了多个“反移民重镇”，促使移民“集体出逃”，不再集中涌入少数传统大都市，而是转向更分散、政治友好的中小城市，在蓝州或包容性都市圈完成“再聚居”，由此形成“文化堡垒”。其次，被动惩罚性迁移出现，如为转嫁联邦责任，同时羞辱“庇护城市”，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的州长安排巴士将非法移民“投送”至纽约、芝加哥、华盛顿等自由派城市。再次，跨境迁移策略调整。随着南部边境执法加强，非法移民开始寻找新入境路线，亚利桑那州的尤马和新墨西哥州的圣特雷莎取代了得克萨斯州传统的伊格尔帕斯和德尔里奥，成为新入境热点。还有人选择过境美国，以加拿大为移民目的地。位于纽约州与加拿大魁北克省交界处的罗克斯汉姆路线（Roxham Road）由此成为非法留居北美的热门替代路径。^③可以说，本土主义异化正在“地理化”美国的移民政策生态，推

① Michael R. Olneck, *Culture Wars in American Education: Past and Present Struggles Over the Symbolic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p.175.

② Brian Miller, “Not All Suburbs Are the Same: The Role of Character in Shap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hree Chicago Suburbs,” *Urban Affairs Review*, 2013, Vol.49, No.5, pp. 652–677.

③ Muzaffar Chishti and Julia Gelatt, “Roxham Road Meets a Dead End? U.S.-Canada Safe Third Country Agreement Is Revised,”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pril 27, 2023,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us-canada-safe-third-country-agreement>.

动移民迁移行为从“经济主导”转向“安全—文化复合导向”，形成移民对地方政治文化的主动规避与适应。由此，美国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庇护地带—排斥地带”二元结构，加剧其国内治理碎片化。^①

第四，“逆同化”（Reverse Assimilation）现象。本土主义异化加剧使得美国的移民群体在面对社会排斥、文化敌意和制度性歧视时，不再主动融入主流文化，反而把选择强化本族群文化认同、构建内聚性更强的族裔社群当作生存与抵抗的策略。具体表现包括：（1）文化回归与身份重申。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随着媒体、学术界和政治驱动的“反白、反美”宣传在洛杉矶逐步起势，该地拉美裔居民之间的泛族裔认同在文化回归过程中有效加强，“逃离白人”以及“拒绝与美国身份和文化规范相关的一切”等立场在拉美裔中潜滋暗长，形成了规模效应和重要文化暗示。（2）政治上的族群动员与抗争意识增强。例如洛杉矶的墨西哥裔社区，尤其是年轻一代，逐渐转向反对美国的移民政策。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他们通过集会、抗议和社会运动，表达对移民改革和移民权益的支持。“团结抵抗”（United We Resist）运动和“庇护城市”政策的推进，就是洛杉矶墨西哥裔群体逆同化的政治表现之一，标志着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②（3）心理与认知的“集体防御机制”。例如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称墨西哥移民为“罪犯”激起了墨西哥裔美国人群体的身份危机和不安全感。一些家长开始选择将孩子送入族裔语言学校或“沉浸式西班牙语学校”，以保护子女的文化身份，避免受到“美国化”的价值影响。同时，社区内部出现了更多“主流美国人不欢迎我们”的循证实践，并逐渐固化作为一种自我认知防线，即“我们只能团结自己人，别指望美国社会会真正接纳我们”。

三、异化结果：特朗普政府移民治理改革的路向及特点

以上述四类新观测变量为内核和路向，特朗普两个任期内的移民治理改革在执行面存在战略一致性和长期结构化意图。^③表现为借助“移民系本土人口生活困境元凶”

① Matt Rivers, “There Is no More American Dream: Migration into US Slows, Reverses South”, ABC News, February 26, 2025, <https://abcnews.go.com/US/american-dream-migration-us-slows-reverses-south/story?id=119187141>.

② Wayne Allensworth, “Silver or Lead: The Reverse Assimilation of the Southwest,” *Chronicles*, August 2014, <https://chroniclesmagazine.org/view/silver-or-lead-the-reverse-assimilation-of-the-southwest/>.

③ Tara Watson and Jonathon Zars, “100 Days of Immigration Under the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 April 29, 2025,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100-days-of-immigration-under-the-second-trump-administration/>.

的福利经济幻象以及强化保守白人中产阶级文化正统的“新郊区理想”，全方位调整移民福利政策与住房安置机制的联动效应；同时出于遏制移民“逆同化”倾向和避免移民利用复杂迁移路径继续流入、留居美国，而将压缩合法移民与打击非法移民并举，且加强与次联邦和关键第三国的移民问题协同治理，以期重塑移民人口分布格局。

第一，全方位调整联动福利与住房安置机制，加剧族裔隔离和文化防御。特朗普两个任期均通过法律、行政和财政手段，逐步减少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享有的社会、医疗、住房、教育等公共福利保障机会，构建一种“福利不可得—移民不可居”的政策生态。2019 年，特朗普政府扩大了“公共负担”定义，将在任何 36 个月期间，接受援助以支付食品、住房、能源、儿童保育，或使用联邦医疗补助和其他非现金福利超过 12 个月的非公民视为公共负担，并可能拒绝他们入境或获取永久居民身份。^① 该定义在 2021 年被拜登政府废除，但 2025 年特朗普上台后宣布重新启动。尽管尚未明确细则，亦可根据其竞选文件和相关表述合理推断，未来公共负担的考察指标或将向教育福利、孕产福利、儿童医保等扩展，同时拟新增“就业稳定性”“居住社区贫困率”等社会经济评估变量。该做法的战略意图不仅是减少非法移民，更是重塑“合法移民画像”。在此基础上，住房安置机制被作为移民政策的“隐性控制工具”，主要通过压缩联邦支持、限制移民获取住房资源、借城市规划强化“非移民友好”环境，以实现对移民的“间接打击”与“驱离效果”。例如 2019 年提出“混合家庭限制规则”，禁止存在无合法身份成员的家庭申请住房援助，即便家庭中有美国公民儿童亦不通融。2020 年废除“积极推进公平住房”政策，放松地方政府责任，令郊区更易排斥低收入、少数族裔和移民家庭。2025 年后则将“治安—安居”挂钩，提升移民生活成本，在城市中推行“无证租赁调查计划”，要求房东核查身份，制造移民租房困难，使其陷入“隐性驱逐”状态。同时借“郊区再生计划”提升郊区门槛，优先吸引白人中产，实质上通过教育、税收、交通配套措施把移民挤压在城市边缘地带。

第二，利用非常规程序推动“合法移民压缩”与“非法移民打击”双线并进。鉴于移民政策是特朗普政府完成保守派集结和测试权力整合极限的关键领域，也是防范移民利用“逆同化”和“复杂迁移策略”自保的关键，因此他在两个任期内大多通过非常规程序完成减少移民流入的总目标，政策层面往往绕过国会立法障碍，大量使用

① Jonathan Beier and Essey Workie, “The Public-Charge Final Rule Is Far from the Last Word,”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September 2022,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news/public-charge-final-rule-far-last-word>.

行政令和总统备忘录就如下目标大做文章：（1）低端人口阻断。这里既包含物理阻断，如在第一个任期签署行政令扩建美墨边境墙，第二任期下令恢复拜登政府中止的边境墙项目，尤其重视得州与亚利桑那州的未完工地段以及里奥格兰德山谷（Rio Grande Valley）等非法入境频繁区域，同时新增配套“虚拟墙”，推动监控塔、无人机、红外传感器与AI识别系统的部署，以补足物理屏障的间隙。可以说，在本土主义异化的感召下，其目标已不再局限于边境控制，而是成为美国国家认同、国家主权与反移民治理能力的象征性工程。当然，防范低端人口“入侵”也涉及制度性阻断，最典型的做法即针对非法移民和难民，限缩“恐同/帮派暴力”类庇护理由，通过“安全第三国协议”要求申请人在过境国申请庇护，减少直接进入美国的庇护申请途径；同时在第一任期内大幅削减难民接纳人数，并在第二任期将新难民的到来与美国人民整体福祉挂钩，声称他们给美国社区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担，随之暂停了难民接纳计划。^①针对合法移民，尝试取消出生公民权，从而减少链式移民和定锚婴儿；增加特定群体入境、入籍难度，如重新解释公共负担测试，使低收入家庭成员更难获得永久居留权；增加签证申请费用、减少工作许可有效期、严格表格填写要求；撤销“追梦人计划”（DACA）、临时保护身份（TPS）和特殊移民未成年人分类（SIJS）等项目的保护。（2）实施“择优移民”制度。减少亲属移民配额，主张只允许“核心家庭团聚”，同时提高投资移民（EB-5）和技术移民（H-1B）门槛，计划推动以教育、英语、技能、薪资、美国价值观认同、可立即就业能力为核心评估指标的移民积分制（Merit-Based Immigration）。^②尽管上述政策在执行层面必然会遭到法律挑战、州和地方政府反对、财政成本增加等阻力，但却被本土主义者视为“向传统致敬”的必要变革手段。

移民执法层面，特朗普政府则采取了大量无视长期行政惯例、削弱司法程序的做法，引发广泛争议和法律诉讼。（1）规避或削弱移民执法的司法程序。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法庭案件积压超300万件的情况下，削减移民法官数量，刻意制造“法律处理瓶颈”，主张多用“加速递解程序”（expedited removal），限制移民进入正当法律程序的机会。其甚至还援引《敌对外国人法》（Alien Enemies Act）不经法院听证，将被指控为帮

① Joseph Stepansky, “How Far Can a President Go?” ALJAZEERA, March 20,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longform/2025/3/20/as-trump-seeks-systemic-change-does-the-us-have-an-obligation-to-refugees>.

② “President Trump Endorses New Immigration Bill Calling for Merit-based System,” Berardi Immigration Law, <https://berardiimmigrationlaw.com/president-trump-endorses-new-immigration-bill-calling-merit-based-system/>.

派成员的移民直接遣送至萨尔瓦多的监狱。^①（2）采取违反长期行政惯例或法律限制的执法方式。如取消“敏感地点执法限制”指导，教堂、学校、医院等地不再是“法外之地”；又如广泛动员非移民执法机构参与驱逐，将约 25% 的缉毒局和 80% 的烟酒枪炮局人员调离原职，协助移民执法。其还与国税局签署谅解备忘录，获取移民报税数据用于逮捕行动。^②（3）强迫移民注册。要求在美居住 30 天以上的所有 14 岁以上非公民注册身份，称其目的是“鼓励自愿离境”，实为施压手段。

第三，加强次联邦与关键第三国协同治理，重塑人口分布格局。特朗普两个任期内移民治理改革的核心不仅在于联邦主导的压缩与阻断机制，更希望通过“次联邦治理”与“关键第三国协同治理”，构建一个可管控、可筛选、可定向的移民流动空间，以重塑美国境内外的移民人口分布格局。对此，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将庇护州/城市视为移民执法的阻力中心，在第一任期签署第 13768 号行政令，威胁切断不配合联邦移民执法的“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第二任期继续打击非法移民庇护，试图搭建联邦数据库，专门记录拒绝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的庇护管辖区信息，将这些地区明确为“非合作治理空间”，限制其获得某些移民或执法资源。还引导蓝州居民把因住房、就业、治安问题而产生的不满归咎于民主党的“庇护政策”，意图制造地方民众与州政府之间的矛盾。作为呼应，特朗普政府还利用非庇护州/城市构建移民排斥带，鼓励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等红州出台本地“反庇护法”，授权地方警察盘查无证移民，以期借次联邦资源达成空间性驱离效果。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试图借助关键第三国，延伸边境外控体系。第一任期实施“留在墨西哥”政策（Migrant Protection Protocols），要求移民在墨西哥申请庇护并等待裁决，将边境压力外移；第二任期预计恢复并扩展该政策，在中美洲建立更广泛的“防火墙网带”。^③另外，签订“安全第三国协议”。特朗普在首度执政期间曾同危地马拉达成《庇护合作协议》，将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非法移民驱逐至危地马拉，从而使危地马拉成为“安全第三国”。如今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重

① Nathali Sánchez, “‘Alien Enemies’ or Innocent Men? Inside Trump’s Rushed Effort to Deport 238 Migrant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5/world/americas/trump-migrants-deportations.html>.

② Tara Watson and Jonathon Zars, “100 Days of Immigration Under The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 April 29, 2025,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100-days-of-immigration-under-the-second-trump-administration/>.

③ Muzaffar Chishti and Kathleen Bush-Joseph, “With ‘Shock and Awe’, the Second Trump Term Opens with a Bid to Strongly Reshape Immigratio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January 23, 2025,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trump-second-term-begins-immigration?utm_source=chatgpt.com.

启该机制，并对其进行升级和调整，为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提供便利条件。^①

总体来看，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继续推进移民治理改革。优化移民结构的部署从“非常规命令”转向多项制度联动与寻求州际协作相结合，工具稳定性增强，覆盖范围扩大，政治统一性更强。提升移民在美生活难度的做法不限于政策阻挠，更通过空间治理和财政配给引导种族隔离与文化“净化”。推进境内外移民人口再分布的计划从“国家边境工程”升级为多重治理联合版图。自此，移民不再主要被视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参与者，而是亟待治理的人口，受到多重监控、迁移管理与福利压制的规训。这种范式转变反映出美国难以遏制的本土主义异化与移民治理安全化趋势，在该逻辑下，“控制”取代“贡献”成为移民治理的主导思维。

四、余论：本土主义移民治理的范式和反噬

鉴于本土主义系围绕排他性民族愿景构建了完整的仇外心理和话语体系，受其异化样态引导的特朗普政府移民治理范式从目标上追求将“非本土”限制、文化和价值保护、本土经济优先、移民治理安全化等要素有机整合。从措施上遵循“选择性本土主义”，一则在吸引科技、医学、工程类人才时较为宽松，但对于难民、庇护申请者则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二则对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实施差异化接纳/排斥策略，如2025年2月，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授权联邦政府吊销参与支持“圣战抗议”活动的外国居民签证，并将其驱逐出境。还在声明中表示，政府将迅速取消所有大学校园内支持哈马斯的学生签证，强调这些校园已被极端主义前所未有地渗透。^②而对另外一些特定类别的国家则给予政策优惠，如作为盟友和战略伙伴的日本、韩国、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均享有免签特权。又如出于缓解边境非法移民压力、实施外交激励、维护区域稳定和满足本国劳动力市场需求及成本的考量，对向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放H-2B非农业类临时工签证给予配额倾斜。

从策略上加强对“非美国化”的抵制。特朗普政府一方面给民主党的移民政策公开贴上“非美国化”标签，原因在于根据奥巴马时期出台《平价医疗法案》的经验，一项国内政策或政策提出者如果被框定为“非美国化”，无论其实施效果如何，都会

① 周默草：《特朗普“三板斧”砍向非法移民》，《环球》2025年2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250218/bf80aea9542349abb5ac5a743683b7b5/c.html>。

②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Takes Forceful and Unprecedented Steps to Combat Anti-Semitism,” January 3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1/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takes-forceful-and-unprecedented-steps-to-combat-anti-semitism/>。

先入为主地引发本土主义者对这项政策及提出者里通外国、思想走偏、观念忘本的担忧，并持坚决反对态度。^①另一方面，积极改写“美国化”概念。据此，特朗普式美国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1）遵循单一同化路径。传统美国化以“文化熔炉”自居，不同背景的移民可以在这里求同存异，共享美国价值观之余仍能部分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特朗普式美国化则更像“筛选器”，要求移民必须完全接受并适应主流美国文化，不能夹带“非美国”元素。（2）秉承经济价值取向。传统美国化认知中，美国欢迎移民，不论背景如何，只要愿意奋斗，都能成为美国人。特朗普式美国化则强调移民的绝对价值，认为只有能够为国家带来切实贡献的人才应该被接纳。（3）美国认同固化。传统美国化主要涉及文化适应和法律归属，对移民是否彻底改变其原始身份认同不做硬性要求。特朗普式美国化则紧扣“绝对忠诚”（totality of allegiance），认为美国公民不应持有“双重忠诚”或深受外国影响。^②（4）贯彻经济与外交民族主义。传统美国化投射至国际舞台表现为美国长期推行全球化政策，认为融入国际体系符合自身利益。而特朗普式美国化突出“美国优先”，认为美国应减少国际责任，集中精力护持本土经济与文化。（5）价值扁平化。传统美国化强调民主、自由、机会平等“普世价值”，并允许对美国历史进行批判性反思。特朗普式美国化则反对任何不利于美国形象的言行。换言之，在异化后的本土主义理念加持下，特朗普将美国化塑造为一个更封闭、更严格、更排他、更强调文化纯粹性和绝对国家忠诚的过程，与传统意义上的包容性美国化概念形成巨大反差。

着眼现实，以本土主义异化样态为内核的移民治理范式在操作层面确实比较易于煽动和借助民意，但长期来看反噬风险较高。原因之一即本土主义处于从抽象价值观到具体政策偏好之间的观念层级。它对处于较低层级的经济意识形态和贸易政策具备兼容性，可直接形成“保护主义”投射，由此为特朗普政府避开复杂情况和政策选择，基于“直觉反应”确定移民政策改革方向提供便利。然而，这种看似简单粗暴的决策捷径极易走向异化，后者往往热衷突出族群和阶级对立，导致群体间的对抗升级，甚至引发暴力冲突；习惯于过度宣扬极端立场，这也使民众难以容忍长效治理和政治妥协艺术，削弱民主协商机制，最终陷入政治僵局。更重要的是本土主义煽动很大程度

① Benjamin Knoll and Jordan Shewmaker, “Simply Un-American: Nativism and Support for Health Care Reform,” *Political Behavior*, Vol.37, No.1, 2015, pp. 87-108.

② Travis Ruddle and Brad Agle, *The Totality of Allegiance: Inside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rump Supporters*, Provo, UT: Freedom Peak Press, 2024, pp.25-30.

上依赖情绪化指引、误导性信息以及拔高社会期待，使事实与谎言真假难辨，长此以往公众或将对美国的选举制度、司法体系、主流媒体等失去信心，从而削弱社会稳定，并最终反噬煽动者本身，使其难以驾驭社会极端立场和行为。

原因之二即就美国当前缺乏包容的社会环境而言，移民政策基调依赖异化后的本土主义等于变向包装、掩盖了种族主义和其他极端思潮对移民群体的攻击性。曾经一些本土主义者极力否认自身带有种族偏狭，表现为不宣称自己文化或制度的优越性，也不指出移民的缺陷，而只求本国“宝贵遗产”自保。他们还提出每个种族都无可厚非，只要他们待在自己的祖国就行。^①但异化情况下，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往往与本土主义如影随形，甚至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显现“跨国性”特征，其目的从保护国家正统转向了优化种族延续或赢得文明对决，使之充当了美国限制移民、难民接收以及干预他国事务的正当化依据。更重要的是，该做法以“防止外来文明入侵”为由，忽视移民和难民的人道需求。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特朗普政府的本土主义移民治理范式显著破坏了美国在人权与全球治理领域的道德权威和领导者形象，压缩了美国与传统盟友在移民与难民政策上的协调空间，助长了其他国家效仿排外的正当性，从而对全球多边合作格局产生负面影响。据此可知，特朗普政府如何在短期本土利益与长期国际责任之间找准平衡，亦为其当前移民治理改革亟须应对的挑战。

【投稿日期 2025-03-03】

【责任编辑：张志洲】

^① Chris Wilson, "Nativism and Terror: Clinging To 'Cherished Heritage,'" Newsroom, March 17, 2019, <https://newsroom.co.nz/2019/03/17/nativism-and-terrorism-blood-and-soil/>.

101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Economic Sanctions on China: Continuity and Change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Term

Jia Linan

【 Abstract 】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first term constructed a three-dimensional system of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compris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sanction programs, and implementation lists, objectively initiating a new wave of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Following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House, this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reinstated, serving as a "pathfinder" for Trump's second-term trade disputes with Chin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policy instruments, and strategic focus of U.S.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during Trump's first term, identifying three key areas: export controls centered on "civil-military fusion"; financial sanctions in non-China issue domains; and financial sanctions under China-related issues,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Hong Kong and Xinjiang.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a comprehensive "New Cold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r falling into a "Thucydides Trap" is not high. Technology, capital, and markets will remain the critical arenas of competition during Trump's second term, with technology competition being the most intense, as its outcomes will determine gains and losses in capital and market acces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sanctions predicated on "human rights" and "security" concerns essentially serve as "accompanying measures," while intense competition for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advantages constitutes the "main theme." During Trump's second term,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will increasingly focus on restricting China's high-technology sectors. As the trade war evolves, the dynamic of sanctions and counter-sanctions will further intensify tensions in U.S.-China relations.

【 Keywords 】 Trump administration, U.S.-China relations, export controls, financial sanctions,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119 The Distorted Nativism: Core Logic and Policy Path of Trump's Migration Governance Reform

Wang Congyue

【 Abstract 】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nativism, which has historically triggered large-scale anti-immigrant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serves as the ideological core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migration governance reforms. Moreover, its distortion provides crucial support and strategic direction for Trump's exploitation of public "panic over the loss of subjectivity," framing reform as a necessary

response to a national crisis. In this process of distortion, nativism exerts influence across all aspects of U.S. migration governance, generating new analytical variables for understanding American society — such as the illusion of a welfare economy, the ideal of a new suburban order, reverse assimilation phenomena, and complex regional migration strategies among immigrants. Based on these, it anchors the trajectory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two rounds of immigration reform. In terms of outcomes, this paradigm shift in migration governance—centered on a distorted form of nativism—not only redefines the meaning of “Americanization,” but also poses fundamental challeng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U.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fulfillment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obligations.

【 Keywords 】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igration governance, nativism, distortion

136 Japan's Maritime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Maritime Power Development

Wang Xu and Song Gang

【 Abstract 】 National identity is tied to self-perception and is inseparable from inter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apan's maritime national identity is a geographically and strategically grounded concept that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of it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Historically, this identity has consistently aligned with Japan's strategic objectives, evolving from a militaristic and expansionist maritime power to a trading nation, and now to a comprehensively developed maritime power. In practice, Japan's maritime identity has adapted to different strategic priorities at various stage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hifting focus from port shipping and maritime technology to the exploit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Today, it is centered on building a strong maritime military power. From a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perspective, Japan's maritime identity aligns with its foreign strategy, presenting different facets to allies, stakehold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deepen mutual trust and expand national interests. While many countries have maritime strategies, not all are maritime nations. For Japan, its maritime strategy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intrinsic unity of its maritime and national strategies is a defining feature of its maritime identity construction. Currently, as the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oceans grows and China accelerates its efforts to become a strong maritime country, Japan's maritime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warrants close attention.

【 Keywords 】 national strategy of Japan, maritime na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China's strong maritime country development